

## 永嘉乱后侨姓、吴姓世族的互动与江南文化性格的形成

姚 蓉

---

**内容摘要：**东晋南朝是世族势力最盛的时期，世族对社会影响至巨。永嘉南渡后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的冲突与融合，又对江南文化性格的形成影响至巨。侨姓世族在政治上对吴姓世族的拉拢和打压，是江南文化性格由刚转柔的重要契机。侨姓世族倡导的玄学影响了吴姓世族的思想观念，从精神自由、闲适情趣、隐逸风气等方面造就了江南文化“逸”的品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的文艺交往与文艺创造，提升了江南文化的水准，促成了江南文化性格由“朴”向“文”转变。后世江南文化所具备的“柔”、“逸”、“文”三种品质，已在东晋南朝时期形成。

**关键词：**永嘉之乱；侨姓世族；吴姓世族；柔；逸；文

**作者简介：**姚蓉（1972-），女，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文为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上海地区文化世族与文学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 12PJC015。

---

**Titl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Surname Qiao and Surname Wu After The Yongjia Rebell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 in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bstract:**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A.D.)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A.D.) is the era when power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reached its peak. The influence of aristocratic families on society is tremendous.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Qiao and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Wu conflicted and fused after Yongjia Southward Migration, which again has tremendous impact upo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 in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political co-optation and suppression made by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Qiao upon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Wu constitute a crucial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 in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strength into tenderness. Metaphysics advocated by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Qiao influenced the ideological conception of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Wu, and endowed the culture in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h “unconstrained and leisured” quality from aspects of spiritual freedom, leisurely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and seclusion atmosphere, etc.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surname Qiao and surname Wu and their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raised level of the culture in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 in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simplicity” into “literariness”. The three qualities, “tenderness”, “unconstraint and leisureliness” and “literariness” possessed in later ages by culture in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came into being in era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Keywords:** The Yongjia Rebellion;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Qiao; Aristocratic Family Surname Wu; Tenderness; Unconstraint and Leisureliness; Literariness

**Author:** Yao Rong (1972- ), female, native place--Changsha, Hunan Province; Doctor of Literature, professor of Shanghai University, doctoral supervisor, engaged in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文化性格是指“文化在人的价值意识建构及其价值思维判断中的特性”<sup>1</sup>，体现为群体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统一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不同地区甚至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如塞北与江南，从自然地理到人文风貌都大相径庭，文化性格各具特色。说起江南，人们想到的是小桥流水、杏花春雨、吴音软语、温柔多情、诗意盎然……不难看出，江南的文化性格偏于柔性。江南地区鲜明的文化性格形成于何时，又有着怎样的具体内容呢？笔者认为，江南文化性格形成于东晋南朝时期，与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后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衣冠南渡”息息相关。

永嘉乱后，北方胡族入主中原，西晋政权土崩瓦解，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王朝。中原汉族士民纷纷迁居江南<sup>2</sup>，《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sup>3</sup>，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北人南迁浪潮。参与迁徙的人员，从皇室贵胄、世家大族到平民百姓，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其中，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结合乡党部曲进行集体迁徙，是当时最重要的移民方式之一。北方许多著名世族的南渡，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北地傅氏、泰山羊氏、太原王氏、彭城刘氏、渤海刁氏等等，都是带着大

01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02 严耀中《江南佛教史》认为：江南“其范围大体上先秦时为吴越，汉属扬州，六朝则称江左、江东或江表。然从政治着眼，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人的眼里，江南就是江左政权的代词，因为后者的都城是定在属于江南的建业（后称建康）”。见《江南佛教史》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03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量人口的家族迁移。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sup>4</sup>，正反映了永嘉乱后北方世族南迁之众。而江南本土，原就有一批世家大族存在，如号称吴地“四姓”的顾、陆、朱、张，号称会稽“四姓”的虞、贺、孔、魏等世族，都是在江南繁衍生息了数百年的望族。于是，渡江南下的“侨姓”世族与江南原有的“吴姓”世族<sup>5</sup>，在东晋南朝时期的不断冲突、交流、碰撞、融合，极大地影响了江南文化性格的形成。

### 一、侨姓世族在政治上对吴姓世族的拉拢、打压与江南“柔”之文化性格的形成

东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国的过程中，得到了北方世族尤其是琅邪王氏的大力支持，王导及堂兄王敦一文一武，为东晋政权在江东立足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致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sup>6</sup>的说法。虽然东晋王朝的政治支柱是南迁的侨姓世族，但统治者很清楚，要想在江南站稳脚跟，必须获得江南本土人士特别是吴姓世族的认可和支持。而司马睿初镇建康时，“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sup>7</sup>，可见吴地士民对司马氏及侨姓世族的漠视和排斥。为此，王导和司马睿开始对吴姓世族进行“攻关”：首先是立威。在三月初三上巳日士民出游踏青之时，王导安排司马睿坐上肩舆外出巡视，并与王敦亲自带领北方世族名流随从其后，仪仗齐备，声势浩大，以威势镇住了吴姓世族的代表顾荣、纪瞻等人，吓得他们纷纷拜倒。然后是笼络。为了获得吴姓世族的支持，司马睿派王导亲自登门造访顾荣、贺循，请他们到朝中任职。为拉近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的关系，王导甚至不顾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之间严格的婚姻界限，主动向吴姓大族陆氏请婚，虽然被陆玩所拒<sup>8</sup>，但王导为稳固司马氏在江东的政权而作的努力还是颇有成效的，作为江东“首望”的顾、陆等族接受了王导的拉拢，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人出仕东晋，自此“君臣之礼始定”，“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sup>9</sup>。

04 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1页。

05 唐代柳芳《氏族论》谓：“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见宋代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中·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7、5678页。

06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07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08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中之上《方正第五》载：“王丞相（王导）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陆玩）。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9页。

09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不过，在成功拉拢吴姓世族共同尊奉司马氏之后，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在东晋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并非完全对等的，侨姓世族一直是东晋政治的主导势力，对吴姓世族多有压制，《晋书》卷五十八有“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驭吴人，吴人颇怨”<sup>10</sup>的记载。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的冲突，尤其体现在对吴姓世族中的武力强宗的打压上。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略可分为二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等是，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sup>11</sup>当时江南的武力强宗，除义兴周氏外，还有吴兴钱氏、沈氏等族。两晋之际，义兴周玘先后镇压石冰领导的流民起义，陈敏、钱璜掀起的反晋叛乱，三定江南，维持了江东的稳定，义兴周氏也因此一门五侯，荣耀至极。但是《晋书·周玘传》也说“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sup>12</sup>，可见世族实力过强，势必为统治者所忌。更何况，“象周氏这样的具有武力与经济实力的地方强宗，最容易与南来北人发生利害冲突”<sup>13</sup>，侨姓世族对周氏颇多防备和排斥。周玘虽有三定江南之功，却不能迅速得到升迁，又为侨姓士人刁协所辱，便有反晋之意，后图谋失败，忧愤而亡。其子周勰继承父志，以讨王导、刁协为名，欲举兵反晋，因叔父周札的反对而功亏一篑。周玘、周勰反晋活动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周氏的势力和影响。而义兴周氏在平定钱璜叛乱时与吴兴钱氏结下仇怨，也遭到同为武力强宗的吴兴沈氏世族的嫉恨，故王敦之乱后期，吴兴钱氏为报宿仇，钱凤挑拨王敦，借吴兴沈充之手，尽诛周氏一门。贵盛一时的义兴周氏，就在侨姓世族和钱氏、沈氏两大吴兴武力强宗的夹击下，遭受了灭门之灾。王敦反叛失败后，沈充、钱凤又相继被杀，钱氏、沈氏世族也遭到重创。从此，吴姓世族再无与侨姓世族抗衡的实力，东晋朝政先后由侨姓世族中的王、庾、桓、谢等族执掌，吴姓世族并无政治上的决定权。

在东晋南朝之前，江南民风彪悍，有好勇尚武之俗。春秋战国时江南一带的吴、越、楚等国都曾兵强马壮，争霸称雄，甚至问鼎中原，连吴地出产的兵器都以锋利闻名天下。秦末项羽亦是带领八千吴中子弟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代霸王。《汉书·地理志》中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sup>14</sup>。三国时期，江东也是名将辈出，陆氏世族的陆逊、陆抗父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了东晋，陆氏早已成为文化强族，但其时江南的武力强宗，如义兴周

- 
- 10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 11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56、156、149页。
  - 12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 13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56、156、149页。
  - 14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7页。

氏、吴兴沈氏等族之子弟多以军功起家，具有能征善战的传统。故在侨姓世族有意压制武力强宗的势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之自相残杀的情况下，周氏、沈氏诸豪族在当时被消灭或被削弱的结局，从政治意义上说，导致吴姓世族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在政坛只能成为侨姓世族的“配角”；从文化意义上说，这也是江南“刚性”的文化性格转“柔”的开端。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出，司马氏与侨姓世族对待两类吴姓世族的态度并不相同，对门第高、声望著的吴郡朱、张、顾、陆及会稽孔、贺等文化世族，是以笼络为主。因吴姓文化世族与侨姓世族具备“阶级和信仰的一致”<sup>15</sup>，且文化世族缺乏强大的武力基础，易于驾驭，故司马氏集团予以他们卿相之位，借助他们的名望收拢江南的民心。对周氏、钱氏、沈氏等武力强宗则是又拉又打，既拉拢他们，利用他们的武装力量稳定江东的局势，又打压他们，想方设法削弱他们的武装实力。武力强宗就算立下汗马功劳，也很难像文化世族那样立致高位，周玘三定江南，仅被任命为吴兴太守，并未在中央任职，吴兴沈氏虽是武力豪族，但其宗族没有出过一位高级官僚。虽然东晋朝廷在对待吴姓世族的态度上重文而轻武，有其政治上的考量，但也是促使吴姓世族朝着文化之族迈进的风向标。连有尚武传统的吴兴沈氏，在齐梁时期也转变为文化世族。永嘉乱后东晋王朝对吴姓世族尚武传统的打压，与下文将要提及的玄学思潮、崇文风尚一起，对江南“柔”之文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二、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在思想上的碰撞、融合与江南“逸”之文化性格的形成

在晋室南渡之前，江南的文化学术风气也与中原大不相同。东晋之前，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区，江南的整体学术文化水平并不高。入晋之后，江南文化世族仍然沿袭汉儒今文经学的学术路子，如吴郡陆氏、会稽虞氏世传《易》学，会稽贺氏世传礼学，注重繁琐的注疏之法，重视象数、占卜之学。而其中中原学术大变，玄学兴起，不再拘泥于儒家章句训诂，融合儒、道，吸纳佛学，在玄谈清言中阐发义理，具有很强的思辨特征。但中原文化的这一新变，却遭到江南文士的强烈抵触与批评，如会稽处士杨泉《物理论》斥玄学为“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sup>16</sup>，会稽虞氏子弟虞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sup>17</sup>，南北学术风气之差异于此可见一斑。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盛行于中原的玄学清谈文化亦随之南迁。琅琊王氏世族作为东晋开国元勋的王导、王敦，同时也是玄学清谈的领袖。他们周围聚集了王

15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56、156、149页。

16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212页。

17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承、谢尚、温峤、殷浩、卫玠、谢鲲、阮放等一批清谈名士，延续着在中原时的玄学旧习及西晋时的思想文化风尚。玄学思潮崇尚《老》、《庄》，也符合东晋王朝不求进取、偏安江左的政治需求，门阀世族更是通过玄谈获得声誉、扩大影响，进而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认为：“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sup>18</sup>在侨姓世族的大力提倡下，玄学尽管受到吴姓世族中虞预等人的指斥，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改变了江南原有的学术文化风气。关于这一点，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已有明确论述：“永嘉乱后，大批名士南渡，本来盛行于京洛的玄学和一些新的理论，从此随着这些渡江名士传播到了江南。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殷氏为首的侨姓高门在江左大畅玄风固不必论，一向偏于保守的江南学门，如吴郡陆氏、会稽虞氏、贺氏等，虽然大体上仍传授汉代以来累世相承的家学，但也不免逐渐为侨人风尚所移，开始注重玄理。特别是吴郡张氏，家世相传，研习玄学，受到新学风的影响更深。”<sup>19</sup>吴郡张氏自西晋张翰起，就开始吸纳玄学。东晋时期，玄学清谈已成为张氏世族的新家风。张玄凭借清谈，得以与陈郡谢玄齐名，时称“南北二玄”<sup>20</sup>。张凭亦以玄谈为侨人所重，据《世说新语》卷上之下《文学第四》记载：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sup>21</sup>

张凭因其出众的清谈才能，得到侨姓玄学名士刘惔的赏识，被举荐为太常博士，从此仕途通达。可见“张氏玄学化门风的形成，给张氏家族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其家族的发展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22</sup>。与张氏世为婚姻的吴郡顾氏，也是吴姓世族中较早习玄的家族。其代表人物顾和就是通过玄谈，成功打入王导、周顗等侨姓重臣的交际圈，获得了他们的赞扬与认同。也因此，顾和将玄谈作为振兴家族的重要手段，培养孙子顾敷和外孙张玄的玄学修

18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1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

20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21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22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学家风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养，促进了顾氏和张氏家风的玄学化。顾氏、张氏等吴姓世族对待玄学的态度，正反映了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在思想文化观念上碰撞、融合的过程。从其时出现的“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sup>23</sup>的局面可看出，玄学已成功地成为江南的主流文化。

盛行于江南的玄学，无可避免地影响了当时江南文化性格的形成。笔者认为，这股玄风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造就了江南文化之“逸”的品质：

第一，自由超脱的精神追求。魏晋玄学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有过多种论述，无不强调“体自然”的重要性，嵇康甚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sup>24</sup>的著名论断，追求超越世俗价值尺度的充分的精神自由。因为试图超逸于规范之外，玄学名士通脱率性、放达任诞，独具飘逸灵动的魏晋风度。这种自由超脱的个性精神，也随着玄学的南移成为江南文化的特质。如《世说新语》卷下之下《排调第二十五》记载：

张苍梧是张凭之祖，尝语凭父曰：“我不如汝。”凭父未解所以。苍梧曰：“汝有佳儿。”凭时年数岁，敛手曰：“阿翁，诘宜以子戏父？”<sup>25</sup>

张凭的祖父调侃自己的儿子，说“我比不上你，你有个好儿子”，结果孙子批评祖父不应该“以子戏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教纲常被祖孙三人的一场玩笑消解，由此也可以看出吴郡张氏玄学化门风的自由通脱特征。

第二，闲适安乐的生活趣味。虽然东晋时期玄风流布江南，但江南士人如葛洪、虞预等人对虚浮放诞的玄学弊端多有批评，侨姓世族也在反思“清谈误国”的历史教训，因此，东晋的玄学名士，少了几分正始名士的癫狂、任诞，更倾向于享受优雅、安闲的生活趣味。且看《世说新语》卷下之上《任诞第二十三》所载的两则逸事：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曰：“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sup>26</sup>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

23 刘勰：《文心雕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2页。

24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25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26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返，何必见戴？”<sup>27</sup>

王徽之（字子猷）暂寄人居而种竹、雪夜访戴而不见戴的行为，仍是魏晋名士一贯率性而为的做派，但已无正始名士如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sup>28</sup>、阮咸与群猪“共饮之”<sup>29</sup>的畸形与病态，而多了生活的安逸与闲适、举止的优雅与潇洒。以王徽之为代表的东晋世族子弟，就如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所说：“他们属于风流文雅的一群。他们来到人世，不是来承担责任而是来享受人生的。”<sup>30</sup>

第三，以隐逸为高的时代风气。隐逸传统自古有之，东晋时此风尤盛。玄学崇尚老庄，追求玄远，超脱世俗，是当时士人远离现实、回归自然的思想基础。再加上侨姓、吴姓世族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拥有大片庄园田地，可为他们的退隐提供丰厚的物质保障，像陶渊明那样躬耕劳作的隐士是极少的，大多数名士的隐逸生活是安定、富足的。故而隐逸成为当时士大夫乐于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以隐逸为高的思想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如陈郡谢氏世族最著名的风流宰相谢安，四十岁之前基本隐居在会稽东山，“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sup>31</sup> 隐逸不仅没有使谢安湮没无闻，而且给他带来赫赫声名，以致时人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sup>32</sup>的感叹。与谢安过从甚密的琅琊王氏之著名人物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sup>33</sup>，永和十一年（355）称病去官，隐居剡县之金庭，“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sup>34</sup>。王羲之由仕而隐、执意辞官，既未被朝廷留难，又得时人敬重，正反映了以隐逸为高是当时的时尚。

永嘉乱后，侨姓世族对玄学的保存与传播，吴姓世族对玄学的接受与吸纳，

- 27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 28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 29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 30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
- 31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 32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 33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 34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使得玄风流布江南，造就了江南“逸”的文化品格。此后，“逸”的品格在江南代有发展，并为江南士人打上鲜明的文化烙印，因此江南有了像陆龟蒙、陈继儒这样的隐逸之士，有像唐寅、徐渭这样的率性之士，有像张岱、李渔这样的精于休闲享乐之士，他们流露出的雅兴“逸”趣，正是江南文化的精髓。

### 三、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在文艺上的交往、整合与江南“文”之文化性格的形成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sup>35</sup>在文学艺术方面，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一起，都为东晋灿烂的文艺创造作出了巨大贡献。

过江的侨姓世族多是家学渊源深厚、富于文化优势的文化望族，本土的吴姓世族如顾、陆、虞、贺等族亦世传家学、代有人才，当侨姓、吴姓世族在政治上合流、在思想上融合的时候，在文学艺术上自然也会互相交流和影响。以吴郡顾氏世族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sup>36</sup>之称的顾恺之（字长康）为例：顾恺之博学多才，尝为《筝赋》，有人问比嵇康《琴赋》如何，他回答说“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sup>37</sup>，其自信若此。他描述会稽山水的名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sup>38</sup>，用语雄丽，状山川之美景如在目前，其文采若此。他为建康瓦官寺绘制的维摩诘壁画，观者如堵，为寺院募得百万钱<sup>39</sup>，其画技绝妙若此。《晋书》本传云“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sup>40</sup>，故而他与侨姓世族颇多交游，与王羲之、桓温、桓玄、殷仲堪、谢瞻等名流关系尤为密切，谢安甚至予以他“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sup>41</sup>的高度评价。顾恺之与侨姓士大夫之间良好的互动，是东晋文艺交往中的佳话。

另一段引人注目的佳话是兰亭集会。这场发生在永和九年（353）三月上巳的文学集会，召集人是王羲之，参与者有琅琊王氏的王羲之及他的六个儿子王玄

35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183页。

36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37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38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39 许嵩：《建康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2、183页。

40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41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8、206、699、656、656、657、631、634、241、241、127、622页。

之、王凝之、王涣之、王肃之、王徽之、王献之，陈郡谢氏的代表谢安和谢万，颍川庾氏的代表庾友和庾蕴，谯国桓氏之桓温的儿子桓伟，高平郗氏的代表郗昙，太原孙氏的代表孙统、孙绰和孙嗣，都是侨姓世族一流高门中的人才。此外，还有一些与会者的身份难以确考，但从姓氏来看似乎来自会稽本土世族，如虞说、虞谷可能为会稽虞氏的代表，谢滕（一作谢胜）可能是会稽谢氏的代表。若如此，则这次聚会可视为江南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共同参与的文学盛举，与会的四十二人（一说四十一人）中有二十六人留下了诗歌作品，王羲之更是写出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故兰亭集会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值得大力肯定。

从上述文人集会与交往的例子可知，不管是侨姓还是吴姓，江南文化世族间的文艺活动与交流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各以其家族特有的文艺成就，为江南“文”之品格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吴姓世族的文化成就原本在经学、史学等领域更为突出，如会稽虞氏之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又究心天文，“乃著《安天论》”<sup>42</sup>，其弟虞预“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sup>43</sup>，会稽贺氏之贺循著有《会稽记》，会稽谢氏之谢沈著有《后汉书》和《晋书》等。不难看出，江南本土文化的品质原本是较为朴质的。但侨姓世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的子弟们，多才华出众、兼善数艺。琅琊王氏兼精文学、绘画、音乐等多种才艺，贡献最大的是书法，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小圣”王献之这样的父子书法家。陈郡谢氏也精于书法、音乐、舞蹈等，但成就最突出的是文学，出现了谢混、谢灵运、谢惠连等一批优秀诗人，谢灵运更是被视为山水诗的开创者。侨姓世族这种文化多元化的特色，或许影响了吴姓世族的文化风气，吴郡陆氏、顾氏家族，在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也颇有建树。吴姓世族与侨姓世族的种种文学艺术成就，说明江南文化水准有了大幅提升，原本落后的文化面貌正为充满活力的文化气息所代替。在江南文化品格由“朴”转“文”的过程中，侨姓世族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sup>44</sup>，给江南文化注入了新的艺术趣味、新的审美追求，江南文艺由此走向讲究文采、讲究意境的优美境界。唐代史学家杜佑在所著《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十二》中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sup>45</sup>这段话，正是对永嘉南渡世族之文化贡献的肯定。

42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43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2554、1745、1746、1574、1573、2147、1369、2072、2073、2098、2101、2404、2349、2147页。

44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7、183页。

45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850页。

从上所述永嘉乱后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在江南地域上进行的政治、思想、文艺等各方面的互动中可以看出，衣冠南渡促使原本在中原的文化中心南移，促成了江南文化性格的形成，后世江南文化的突出特征如“柔”、“逸”、“文”等要素，在此期的文化转型中已初步显现出来。后世柔美的、性灵的、人文鼎盛的江南文化，已由此发端，并将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丰富和丰满起来。

### 参考文献

- 班固（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 杜佑（1988）。《通典》。北京：中华书局。
- 房玄龄等（1974）。《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 李百药（1972）。《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
- 李昉等（1960）。《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
- 刘勰（2008）。《文心雕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2011）。《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
- 罗宗强（2005）。《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 司马云杰（2004）。《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唐长孺（1993）。《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王永平（2003）。《六朝江东世族之家学家风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万绳楠（1987）。《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
- 田余庆（2005）。《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许嵩（1987）。《建康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宗白华（1981）。《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